

试述潘懋元先生的学术思想体系

杨广云

潘懋元先生是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倡导者, 高等教育学的开创者。早在 50 年代, 他就倡导建立高等教育学; 1978 年, 他领导成立了全国第一个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厦门大学高教室; 1981 年, 他开始招收中国第一个高等教育学硕士生; 1984 年, 他主编并出版了中国第一部《高等教育学》专著; 1986 年, 他开始招收中国第一个高等教育学博士研究生; 1988 年, 他领导的厦门大学高教研究所被评为全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唯一重点学科点。本人认为, 潘懋元先生的学术思想, 可以从下述 4 个方面开展研究: (一) 开创学科, 提出一套学科研究方法论; (二) 重建教育原理体系, 奠定高教基础理论; (三) 科学预见中国高教改革的若干趋势; (四) 指出高等教育学科群若干学科建设的方向。其中, 第一、二方面体现了潘懋元先生学术思想体系的主要内容, 也是他的其它学术思想的理论基础。本文试图对这两方面的内容作一整理和归纳。

一、开创学科, 提出一套学科研究方法论

1 突破旧教育学框框, 率先提出建立并开创新学科

早在 50 年代, 潘懋元先生就以一个教育理论家的洞察力深刻地认识到高等专业教育的复杂性不是以普通教育为对象的普通教育学所能概括的, 并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倡导建立一门以研究高等教育特殊规律为任务的高等专业教育学。同时, 他还为高等教育学的建立进行了初步的论证。之后, 他动员厦门大学教育学教研室的同事一道编出了我国第一部《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 这是我国对高等教育开展全面研究的开拓性工作。

粉碎“四人帮”以后, 在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高等教育面临着大发展、大改革的形势下, 潘懋元先生全面论证了建立高等教育学的必要性。第一, 教育学的对象应当包括各级各类的教育, 高等教育理论应是其组成部分。但现有教育学基本以普通学校作为它的研究对象, 不涉及高等教育, 由这种教育学总结出来的理论不完全(有些完全不)适用于指导高等教育的工作。因此, 必须建立一门以高等教育的特殊问题为研究对象的教育学分支学科。第二, 高等教育是建立在普通教育基础之上的专业教育, 它与国民经济各部门、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密切的联系。正是这种联系, 决定了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专业设置、教学过程特点等与普通教育大不一样, 而普通教育学并不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第三, 大学生是 20 岁左右的年轻人, 他们的身心发展特征和社会经验与中学生是不同的。这就决定了高等学校的教学过程、教学原则、教学方法与形式以及德、智、体诸育的具体内容、学校的组织领导等, 与中小

杨广云, 厦门大学高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

学迥然相异。第四,建国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曲折前进,大起大落,其中有成绩,也有错误。建立高等教育学,有助于从理论上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肃清“四人帮”在高教领域里的流毒,用科学规范高等教育的发展。潘懋元先生的《论高等专业教育问题在教育学上的重要地位》以及《必须开展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建立高等教育学刍议》这两篇文章,是他从理论上论证建立高等教育学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的奠基作。而1984年他主编的《高等教育学》一书的出版,则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学的初步建立。在潘懋元先生的积极倡导、呼吁下,由于广大高教研究同仁的努力,今天高等教育学已发展成为学科群,高等教育研究方兴未艾。

2 突破传统学科标准,提出一套高等教育学科研究方法论

一般认为,一门独立学科最重要的标准有3条:学科研究对象;学科研究方法;学科理论体系。一些国外学者认为,高等教育研究由于缺乏学科特有的研究方法及理论体系,因此,它只能作为一门学术领域。潘懋元先生却认为,学科和领域不是对立的,研究领域是指有一定研究对象的范围。一门学科的建立,最基本的依据在于它的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研究对象,在于它的特殊规律。高等教育学由于有它的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研究对象,更由于有它特殊的、不同于普通教育的规律,因而可以构成一门独立的学科。而该门学科的方法论体系、理论体系等,只能是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完善、成熟。事实已证明,现代科学中已出现许多学科方法互为通用或借鉴其它科学方法的科学,特别是在社会科学领域及一部分综合科学,诸如环境科学、生态科学中。国内外一些高教研究者也已经认识到,多学科的方法乃是教育科学(包括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本质。因此,不能固守几条传统的学科标准,以此求全责备某些新兴的学科。

在高等教育学科的发展阶段问题上,潘懋元先生认为,如果将一门学科分为初创、发展、成熟3个阶段的话,那么,高等教育学科当前正处于发展阶段的初期,是逐渐走向成熟的一门学科。其依据是,我国高等教育学科的研究机构、研究队伍、研究刊物、学科群建设等指标已位居世界前列。

关于高等教育学在整个教育科学中的位置,潘懋元先生将教育科学划分为3类,第一类是教育学的分化学科,如教育原理;第二类是教育学与其它学科形成的交叉学科,如教育哲学;第三类是研究不同教育对象形成的学科,如高等教育学。高等教育学是应用教育学的基础理论解决高等专业教育特殊规律的学科,因而是应用性理论学科。但实际上,现有的教育学并不研究高等教育问题,因此,必须以高等教育学科的研究成果来丰富、深化教育学原理。

在高等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上,潘懋元先生认为,高等教育学以揭示高等专业教育的特殊规律,论述培养专门人才的理论与方法为研究任务。在研究范围方面,他认为,应当以全日制普通高校的本科教育的研究为主。因为普通本科教育是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基本组成部分,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比较稳定;在这方面的研究理论比较成熟,经验比较丰富。虽然它的理论、原则并不完全符合各种类型、层次高等教育的实际,但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代表性。对其它层次、类型高等教育的研究,可作为高等教育科学的分支学科,分门别类地专门加以探讨。

在构建学科体系方面,潘懋元先生认为,高等教育学主要分为3种体系,即理论体系、知识体系(或工作体系、经验体系)和教材体系(或课程体系)。理论体系应当揭示一系列教育科学概念、规律,构成逻辑严密的系统。而这样的科学理论体系,不但高等教育学尚未形成,教育学也很难说已经形成。课程体系应当是根据培养目标的要求,依据认知心理和教学原则来组织编写教材,这样的高等教育学也未形成。现有的高等教育学专著大多是从教育学的知识体系移植过来的,因理论知识少,应用知识多,故称之为经验体系或工作体系。他认为,形成高等教育学科

的理论体系,编写出符合课程体系的教材,是高等教育学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是高教研究工作者应长期努力完成的两项任务。目前,学科建设的任务主要是改善知识体系,使之符合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要求,便于学习,便于操作。

在高等教育学科研究方法上,潘懋元先生提出应将研究方法 with 建立理论体系的方法区别开来。他认为高等教育学是应用性理论学科,不能像哲学、数学的纯粹理论那样,从“公理”出发进行推导,而一般应遵循“教育实践→经验总结→应用性理论”的研究方法,即从具体上升到抽象。建立理论体系的方法则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但抽象到具体的方法运用应当以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为前提。

关于高等教育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潘懋元先生认为就理论价值而言,教育的基本理论越是抽象,离实践越远,就越能蕴涵众多的教育现象,越具有普遍性。教育的内外部规律是教育活动中最一般的规律,用它来考察一切教育问题,能够看得更全面、更深远,更能揭示各种教育问题的本质。当然,抽象的理论与具体的现实之间存在一系列中间环节,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弄清楚它们之间的关系的。他又说,教育的基本理论虽然一般不能直接转化为教育实践,但却具有更为普遍的、深层次的指导教育改革实践的作用。就应用价值而言,高教理论工作者应当改变学风,将研究的视角转向改革实践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将研究的科学性与可行性结合起来。只有这样,研究的成果才有可能为国家教育决策部门参考、采纳。事实上,高教研究的成果已经通过多种渠道体现在诸如《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等政策文件之中。但更重要、更为直接的影响应当是转化为高校广大教师和干部的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活动。只有广大教师和干部都重视高教研究,高教研究才能充分发挥自身的价值。因此,要发动广大教师、干部开展高教研究。虽然,他们发表的大多数文章学术水平不高,但其经验总结对提高广大教师、干部教学、管理的水平有着重要的价值。

二、重建教育原理体系,奠定高教基础理论

1 补原教育学之不足,重建教育原理体系

关于教育的本质属性,潘懋元先生认为,培养人的社会活动即教育的本质属性。培养人体现了教育这一事物的基本特征,并以之与其它事物相区别。关于教育是生产力还是上层建筑的论争并非教育本质的论争,它是教育的社会属性的论争。教育虽然具有生产力、上层建筑(或生产性、阶级性)的属性,但其它许多社会现象也具有这些属性。

关于教育的功能,潘懋元先生认为,教育的功能尽管有许多,诸如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个性等功能,但从总体上可概括为两大功能,一为促进社会发展的功能,二为促进个性发展的功能。理由如下:第一,从教育的本质内涵出发,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对象是人,直接作用于人,只有通过发展个性,才能发挥教育的其它功能。第二,教育是一项社会活动,教育只能在社会的环境下培养人。第三,社会由人的群体构成,社会效益是人的群体活动之效益,教育的效益也是人的群体活动之效益。第四,人无抽象价值,人的价值体现在社会价值之中,教育的价值体现在社会价值之中。因此,教育虽然具有两种功能,但统一于社会活动之中。

关于教育的内外部关系的规律,潘懋元先生认为,由教育的两大功能及其统一性出发,可以引出教育的两条基本规律,即教育的外部关系的规律和教育的内部关系的规律。教育的外部

关系规律是教育同社会发展的关系的规律,指的是教育必须受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所制约,并为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服务;教育的内部关系的规律是教育同人的发展的关系,是指教育必须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教育的内外部关系的规律是相互起作用的,内部关系规律的运用要受外部关系规律的制约,外部关系规律又必须通过内部关系规律来实现。因此,如果只考虑教育的内部规律,“就教育谈教育”,而不考虑是否符合社会需要,则教育必定是保守的,甚至是落后的。另一方面,如果忽视教育的内部规律,不“就教育论教育”,也是片面的,这样的教育只能是工具的教育。当前,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既要积极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改革自身,又不能忽视教育自身的规律,简单地将市场经济的规律运用到教育中去。

关于教育的价值观,潘懋元先生认为,从教育的外部规律与教育的内部规律关系的统一来看,应当将社会需要同人的需要统一起来。正确的教育价值观是把社会发展的需要同人的自身发展的需要相结合的教育价值观,其中大前提是培养的人必须满足社会的需要,同时应当充分考虑人自身发展个性的需要。

2 深化教育原理认识,奠定高教基础理论

潘懋元先生认为,从高等教育角度研究教育原理,诸如教育本质、属性、功能、规律、价值观等,比从普通教育角度研究更深刻,更全面。因为高等教育与科技、生产力、上层建筑、文化的关系,比之于普通教育有更为直接的制约关系。从上述教育原理出发,他进一步研究高等教育的特殊矛盾与规律。

潘懋元先生认为,高等教育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社会活动,它与普通学校教育相区别的特点在于“高”与“专”,这也就是高等教育的本质特点。对高等教育培养目标是专才还是通才的争论,他认为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受文化科学技术水平所制约。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是高度分化与高度综合相结合。专而不通,不能在科学高度综合的时代取胜;通而不专,也不能在科学高度分化的时代立足。因此,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应当是既通又专,在通的基础上又有所专,既掌握专门知识又能融会贯通。最优化的知识结构应当是有比较宽厚的基础知识;有一定深度的专门知识;对学科前沿及相邻学科的动态有所了解;具有必要的横向学科的基本知识;具有一般文化素养。在智能结构上,要求一般智能与特殊智能相结合。当然,各类型、各层次高等教育在通、专的具体比重上是不同的,应根据社会需要,结合学校自身的特点来制定具体的培养目标,不能“一刀切”。

对高等教育的功能与高等学校的职能问题,潘懋元先生认为,“功能”与“职能”是两个内涵不同的概念,不能混用。高等教育的功能是高等教育的作用,它是由教育的本质属性决定的。高等教育的功能有多种多样,但主要有三大功能或四大功能。高等教育的功能与普通教育相比,对于政治、经济的作用更直接、更巨大;对于文化,则除了选择、传递的作用外,还有创新、发展的作用;对于发展个性的作用,是指培养高级专门人才。“职能”是指高等学校是一个有职责的实体,现代高等学校一般具有培养人才、发展科学、直接为社会服务 3 项职能。他认为,高等学校的 3 项职能的产生与发展是有规律的。先是培养人的职能,然后依次出现发展科学、直接为社会服务的职能。它的重要性也跟产生的顺序一致,不能颠倒过来;高校职能发展的总趋势是从单一向多样化发展;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高等学校对于不同职能应当有所偏重,不能“一刀切”;开展直接为社会服务的活动,应当着眼于社会效益、国家的经济效益。(下转第 52 页)

改善?道德的价值判断应当以什么为标准?应当采取什么有效的方法使之更好地达到高校德育的目标?难,但不是不可为。改革开放以来,理论上、实践上的探索,已取得了一些相对明确的共识。例如,已认识到市场经济对高校德育具有积极、消极的“双重效应”,使教育者能够冷静地思考如何主动适应市场经济的积极面,而不要陷于被动地适应其消极面;也获得了一些有效的方法与经验,如情理相融、自我修养、社会实践、心理咨询等等。因此,如何把理论与实践的探索所取得的成果集中起来,推广出去,应是我们高等教育理论工作者的任务。

周光迅同志的近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高等学校德育建设》一书,就是力图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对我国当前高校德育现状和各种不同的观点进行分析研究;从中国高校德育历史的反思和各国德育模式的比较中吸取有益经验;并从大量的探索德育改革的实践经验与方案措施中取其精华,整理成“两课”改革与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探索。最后提出高等学校德育的体系,包括学科体系、理论体系、方法体系和管理体系。

我只读了这本新作的目录和其中4章初稿,未能竟读全书。粗知这本新作有两个特点。其一是对高等学校德育的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状、国内与国际经验,进行系统的整理,可谓集其大成;其二是提出许多合理的见解。由于作者不仅从事德育理论研究工作,而且有多年的高等学校德育工作经验,因而所提出的许多理论见解,能很好地解释实际问题;许多办法措施,切实可行。相信这本新作的出版,有利于解决高等学校德育建设这一难题,指导高等学校的德育工作。

(上接第12页) 高校自身的经济效益不能有益于社会效益和国家经济效益,第三职能不能影响高校第一、第二职能的发展。

从高等教育角度,潘懋元先生进一步深入研究并阐述了教育的内外部关系规律对高等教育的作用机制。他认为,教育这种培养人的社会活动受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的身心发展规律所制约,具体受以下4种因素制约。第一,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目标与规格,高等教育发展的规模与速度,高等学校的教育制度、教学内容、教学手段等,都受其制约。第二,社会制度,包括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中国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价值观显然应当体现社会发展和个人需要的统一,而不是以个人需要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的教育价值观。就经济制度而言,代之于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要对高等教育产生全面冲击。我国的高等教育应主动适应市场经济带来的积极作用,克服其消极影响;必须依据教育内部的规律使外部规律的作用符合教育自身的价值。教育的社会经济价值与非经济价值、教育效益的长效性和市场经济的短期效益等关系。第三,文化传统。文化传统对高等教育的德、智、体、美诸育有广泛的影响,其它社会因素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往往要通过文化传统的折射。从影响的范围看,它不仅反映在教育的价值观和培养目标上,也渗透在教育体制、课程、教材、道德教育以及教学方法和教学组织形式之中;从影响的方式和途径看,既有来自社会意识、社会道德、社会舆论的影响,也有来自个人深层心理的影响。第四,学生身心发展的年龄特征。在上述4种因素中,第一种、第四种因素各国的共性较多;第二种、第三种因素则各国的特性较多。其中,生产力和科技发展水平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是明显的重要因素;文化传统是潜在的重要因素;而这些因素对高等教育的影响都必然要受到大学生身心发展特征的制约,即必须通过教育的内部规律发挥作用。